

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

◎ 金承艺 著



中華書局

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

◎ 金承艺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 / 金承艺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0.10

ISBN 978 - 7 - 101 - 07470 - 3

I. 清… II. 金… III. 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IV. 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0)第 117757 号

-
- 书 名 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
著 者 金承艺
责任编辑 罗丹妮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1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0¼ 插页 2 字数 250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470 - 3
定 价 48.00 元
-

何兹全先生的话

侄儿芳桂偕孟繁之君来，嘱我为即将出版的《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写几句话。

金先生这本清史论集的第一篇，即《萨尔浒战前的辽东情况——从何尔健上明神宗疏奏看当时辽东的残破》一文，是依据我与爱妻郭良玉近三十年前编校的《按辽御珰疏稿》为材料展开论述的。那本小册子1982年由中州书画社出版，是明朝万历三十年到三十一年（1602—1603）间，我的五世祖何尔健给明神宗上疏的稿子。疏稿揭露了宦官高淮的罪行，反映了其时辽东地区的社会面貌和边防情况。金先生以此发覆，论说明末汉族和女真族两族势力的消长，是研究明末清初汉满关系史的一篇重要文献。对于金先生的这份厚爱，我在此表示感谢！

何兹全

2009年7月

序 言

阎崇年

金承艺先生的《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我期盼已久的事情。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应邀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看到金承艺先生关于清史的论文，特别是关于雍正帝继位的论文，耳目一新。接着寻访金承艺先生的清史文集，几经查索，结果落空。

金承艺先生的论文，先后发表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故宫季刊》、《汉学研究》和《满族文化》等刊物上，海峡两岸，波涛阻隔，大陆读者，很难看到。因此我期待有一天到台湾查阅我关心的台湾刊物发表的清史研究论文。

1992年，承蒙台湾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兼历史研究所所长陈捷先教授邀请，我到台湾出席“海峡两岸清史—档案学术研讨会”，下榻在台北中研院学术交流中心。我即向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存武研究员问询金承艺先生的近况，因金先生时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虽略有了解，却未能谋面。这是我第一次到台湾，日程排满，行期紧凑，没有时间到图书馆去查阅金承艺先生的学术论文。1997年，我在台湾四十天，看了一些书，查了点资料，但

限于种种条件,未能细读先生大文。尔后,两次赴台,都有任务,来去匆匆,亦未暇及。2008年和2009年,我先后在台湾佛光大学和南华大学任客座教授,讲授《清史通论》课,有空静下来,在图书馆里,查阅并复印金承艺先生发表的清史论文,装订成集,携带回京。

金承艺(1926—1996)先生本来不是学清史的,也不是专业研究清史的,但他于清史探索,用功颇勤,独具慧眼,另辟蹊径,卓有成绩。本书所收录的十五篇论文,时间跨度很长,涉及有清一代。集中的论文,可分为三组:第一组为初清三篇,即《萨尔浒战前的辽东情况》、《努尔哈赤的一生》和《皇太极的继承汗位》;第二组为盛清七篇,即《康熙帝玄烨入承大统实录》、《从〈永宪录〉来讨论年羹尧的年岁》、《一项有关清世宗是否夺位的重要问题之探讨》、《关于清世宗皇三子弘时》等;第三组为晚清四篇,即《奕訢受封恭亲王始末》、《慈禧太后的家族》、《关于同治帝遗诏立载澍为帝一事的辩证》、《关于李连英的记述》;另有附录一篇。

本集特点,主要有四:一是重政治史,这同先生曾就学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学习经历有关;二是重考据,这同他师从胡适先生、任其学术助手并受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理念影响有关;三是重宫廷史,这同他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嫡长孙杜度(褚英长子)后裔的宗室家庭背景有关;四是着力于雍正帝继位合法性的学术考辨,则是他的研究旨趣。

人们常说:一石激起千层浪。金承艺先生以学者的勇气,不循众见,不畏人言,激起康雍研究的学术波浪。他留给史坛的主要学术财富,是他对雍正帝继位问题的考据与思辨。这主要反映在他所发表的盛清时期七篇论文中的三篇论文——《从“胤禔”问题看清世宗夺位》、《胤禛:一个帝梦成空的皇子》和《“胤禛”非清世宗本来名讳的探讨》。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清圣祖御制文集》、弘旺(皇八子允禩之子)《皇清通志纲要》、允禩(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奏稿》、清内阁大库档案以及李朝官私史料《同文汇考》、《燕行录》、《使臣别单》等当时文献中,爬梳史料,缜密考辨,系统而周密地论证康熙帝第十四子名字原为“胤禛”,而非“胤禔”,并被清史界所接受。他推论康熙帝本意传位于皇十四子胤禔,其时胤禔在甘州,而皇位被雍亲王取得。

金承艺先生的学术见解,引发清雍正朝历史研究专家的激烈驳辩。《雍正传》著者、我的“三同”(同年、同月、同日生)学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冯尔康教授,《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著者、日本姬路独协大学杨启樵教授, *Autocracy at Work: A Study of the Yung-cheng Period, 1723-1735* (《雍正史论》)著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黄培教授,《雍正写真》著者、台湾大学历史系陈捷先教授等,都以不同形式载体,就此问题进行学术论辩。

但是,著名清史学家庄吉发教授认为:“皇十四子的旧名叫做胤禵,康熙三十六年修造的《宗室玉牒》的纪录已足以澄清‘胤禵’为伪造的假名之疑。清圣祖将皇十四子胤禵改名为胤禛,所以康熙末年的文书及文集等出现‘胤禛’的名字。清世宗入承大统后,恢复皇十四子的旧名,并非出于所谓篡改清圣祖遗诏的政治需要。清世宗即位后,避讳御名,其兄弟名上一字即‘胤’字改为‘允’,其与御名‘禛’字形声近似者,例应避讳。皇十四子更名为‘允禛’,可以说是因利乘便的避讳方式,就因清世宗恢复同母弟的旧名,从此以后各类文书或官书一律书写‘允禵’,‘允禛’字样停止使用,于是乃有改‘十’为‘于’及改‘禛’为‘禛’等矫诏篡夺的流言。”(庄吉发:《清史论集》十二)

当然,反对雍正帝合法继位说的学者(包括金承艺先生),至今尚未提出经过考据的、令人信服的确凿史料做依据;同样,坚持雍正帝合法继位说的学者,至今也不能从情理上说服持相反意见的学者。因此,正如著名清史大家孟森先生所言,“清世宗入承大统”问题,仍是清史的一大疑案。

金承艺先生改行转攻清史的一个动因,是“因言贾祸,播迁澳洲”。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言:“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同样,清代著名书法家蒋衡科举失意,“键户十二年,书写十三经”。他的同乡金坛人段玉裁也只是举人学历,辞谢县令,返回乡里,“键户不问世事者三十余年”(《清史稿·段玉裁传》),完成《说文解字注》。一个学者,要感谢挫折,要“君子不器”,这是前人学者以及金承艺先生留给人们的一点启示。

金承艺先生的论文,还给人们一点启发:学术问题,贵在争鸣。不趋时

媚俗，不跟风炒作，认真查阅资料，明确亮出观点，卓尔不阿，超然独立，这才是学者的品格，也才是学术的风尚。

本论集的因缘，孟繁之先生编校整理，先生胞弟金承涛先生授权支持，张存武先生热心加持，李静女士创意选题，促成了本书问世，为读者提供方便。

我作为清史学者，谨对《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的出版，敬示诚谢，并作推荐。

2010年4月

目 录

序 言	阎崇年 1
-----	-------

萨尔浒战前的辽东情况

——从何尔健上明神宗疏奏看当时辽东的残破	1
一、前言	1
二、何尔健及其“疏稿”	6
三、“疏稿”中的辽东	8
四、佐证“疏稿”的其他史料	19
努尔哈赤的一生	23
皇太极的继承汗位	33
康熙帝玄烨入承大统实录	48
从《永宪录》来讨论年羹尧的年岁	64
从“胤禩”问题看清世宗夺位	82

一、“胤禔”的问题	82
二、更名与夺位	98
胤禛：一个帝梦成空的皇子	118
一、清世宗笔下的胤禛	118
二、《圣祖实录》上的胤禛	125
三、大将军的派出与皇储之关系	129
四、一些疑问的解决	139
五、忧患余生	148
“胤禛”非清世宗本来名讳的探讨	152
一、史料上的不同记载	152
二、伪造名讳的推断	159
三、追查世宗名讳的线索	179
一项有关清世宗是否夺位的重要问题之探讨	186
关于清世宗皇三子弘时	
——看一代帝王的家庭悲剧	204
奕訢受封恭亲王始末	224
慈禧太后的家族	232
一、慈禧太后的尊长部分	232
二、慈禧太后的兄弟姊妹部分	233
三、慈禧太后的侄男女部分	236
四、辩正部分	242
五、附言部分	245
关于同治帝遗诏立载澍为帝一事的辩正	247
关于李连英的记述	257
一、前言	257

二、两处墓葬问题	258
三、大内总管李公墓志	262
四、陪阅海军情实	264
五、弄权纳贿之自辩	266
六、李家宅第	271
七、在宫府及外臣间的角色	273
八、“篋小李”及其族属	279
九、后记	282
附录：论《景善日记》不伪	284

吴可读《罔极编》手稿的发现

——一个真史料掺入假史料的举例	287
一、引言	287
二、一些疑问	290
三、史料真相的发现	292
四、赘言	296
五、《罔极编》手稿及释文	298

编者手记	孟繁之 309
------------	---------

萨尔浒战前的辽东情况

——从何尔健上明神宗疏奏看当时辽东的残破

一、前言

被追奉为清太祖的努尔哈赤，是在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元天命，称后金汗的。

在这时和在这之前，虽然他已先后克服了哲陈、东海、哈达、乌喇、辉发……诸部，尽收鸭绿江、图门江以北的土地，建立了八旗军制，秣马厉兵，欲图大举，可是对于明朝，一直还没有过公开的军事冲突，表面上仍旧维持着恭顺的态度。

然而两年以后，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终于以“七大恨告天”，开始在辽东对明朝的汛地用兵。当时女真人固然文化落后，惟努尔哈赤也了解到激励士气的重要性，所谓以“七大恨告天”者，实是仿效像唐代骆宾王为徐敬业之草讨武氏檄一样，不过它简陋得多地杂凑了七项理由^①去鼓动军

^① 按所谓“大恨七宗”的史料记载，每有出入。现根据早出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的记载，所

心,作为一种挑起复仇心理的“誓师”举动而已。

努尔哈赤于四月时大兵一出,明朝抚顺守将李永芳首以城降。驰援抚顺的广宁总兵张承荫、辽阳副将颇廷相、海州参将蒲世芳等追踪而至,与女真兵发生遭遇战,据《明史·张承荫传》的记载,这一仗明军主帅均阵亡,而“将士死者万人,生还者十无一二”。后金兵俘获的军事物资,即有“战马九千匹,甲七千付”。两个多月以后,后金又占领了清河堡,守城将领邹储贤并合城军民,全部壮烈牺牲。

第二年,初春二三月间,明朝与后金间,遂爆发了闻名史书的萨尔浒之战。这是在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亦即1619年的时候。在此次战役中,努尔哈赤自是使用了后金的全部力量,而明朝也把国内的精兵猛将悉力以赴,双方动员的兵力,约在二十万左右,明朝的兵力大概是后金兵的两倍至三倍^①,这一战是明朝后期和清代未入关前最重要的一次大会战。

如所周知,这次双方投入近二十万兵力的大战役,其实在不出五六天的时间内,战局差不多就全部结束了——后金兵获得全胜,死伤极少;明朝四路大军之中,以杜松和刘綎为主帅的两路,将兵们尽遭歼灭,马林的一路,除他自己仅以身免外,副帅麻岩阵亡,将兵也折伤惨重,只有李如柏的一路,由于尚未投入战场,幸得保全^②。阵亡的总数字,据王在晋^③写的《三朝辽事实

云“大恨七宗”者,约为:父祖无端为明兵杀害,恨一。明兵违背和好盟誓,越边助叶赫,恨二。汉人窃入女真地区被戮,而明朝勒令献出十名女真人杀之边上偿命,恨三。明朝兵助叶赫,使早已许嫁努尔哈赤之女,转婚蒙古,恨四。明朝逼命退地,致不容女真人收获田谷,恨五。明朝偏袒叶赫,以恶言责女真,恨六。明朝逆天行事,出兵助天谴之哈达及叶赫,是非倒置,有失大国共主之体,恨七。

① 史书中对萨尔浒之战双方动员的兵力,多有夸张。当时明兵号称“四十七万”大军,究其实,似不应超过十五六万人;而后金兵依合理的估计,大约在五万人左右。

② 李如柏为明名将李成梁第二子。据《明史·李如柏传》所载,萨尔浒之役,“杨镐四路出师,令如柏以一军出鸦鹘关,甫抵虎拦路,辄闻杜松、马林两军已覆,急檄如柏还”。然而还师时,“清哨兵二十人见之,登山鸣螺,作大军追击状,如柏军大惊,奔走相蹴,死者千余人”。后,如柏入都,御史交章论劾,如柏惧罪自杀死。

③ 王在晋,明,江苏太仓人,神宗万历二十年进士,历任山东巡抚,兵部尚书,熹宗天启时,曾代熊廷弼经略辽东,编有《三朝辽事实录》十七卷。

录》卷一中所载，是“文武将吏死亡三百一十馀员，军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七十馀人，阵失马、骡、驼共二万八千六百馀匹”。

萨尔浒一战是后金和明朝在辽东地区形势盛衰的关键。自兹以后，后金对辽东的局面操纵了全部的主动权，明朝的将领，只有招架之功和挨打的份儿了。就连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祖大寿等这些名将，究其表现，也不过是在当地勉强应付支持一段时期罢了。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努尔哈赤所率的后金兵，这样轻而易举地在萨尔浒之战中获胜？为什么明朝的大军溃败得如此出人意料呢？是否因为二三月时辽东的严寒气候，部分来自关内的士兵们尚不能适应，女真兵得“天时”之利，使明兵一败涂地呢？是否由于后金兵对地理形势的熟悉，以逸待劳，得“地利”之便，使明兵一败涂地呢？是否因为明朝的骄兵悍将们^①各行其是，以致军力分散，而努尔哈赤的子侄们却均同心同德，团结对外，得“人和”之助，使明兵一败涂地呢？抑还是，仅只因明兵主帅杨镐，是一碌碌庸才，他在前此军援朝鲜的战役中，就毫无表现，曾是日本丰臣秀吉手下败将^②，这次依然调度无方，贻误戎机，所以再遭丧师之耻，使国家蒙受羞辱呢？

对于这些问题，前辈史学家早曾分析过萨尔浒之战明军致败的原因了，虽然他们的分析，大体不出前面列举的这些理由。可是我们仍要追问：即使具备了前列这些失败的因素，难道一支十万以上的大军，就会在三五天的时间里溃败得如此凄惨，如此的快速吗？

历史是立体的，多层面的；任何事件的真相，都不会只像史书记载的那么简单和平面。像萨尔浒之战，促成这次军事上惨败的结果之前，必早已有

^① 据史书所记，如中路主帅杜松，《明史·杜松传》载：“松，为将廉，尚气，不能容物”，批评他“勇而无谋，刚愎使气”。袁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记萨尔浒之役，说他骄傲轻敌，贪功冒进，有“勿令诸将分功”语。如南路主帅刘綎，《明史·刘綎传》载他“威名震海内……所用镔铁刀百二十斤，马上抡转如飞，天下称刘大刀”，而述其性格则称“綎为将，数被黜抑，性骄恣如故”。至如北路主帅马林，据《明神宗实录》载，林麾下开原道兵备佥事潘宗颜，于出师前曾致书经略杨镐，言：“林庸懦，不堪一面之寄，乞易别帅当此重任，而以林遥作后应，庶其有济。”杨镐不纳其请。

^② 杨镐，河南商丘人，明万历八年进士。万历二十年日本侵朝鲜，二十五年神宗擢杨镐右金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镐至朝鲜，坐失机宜，致次年有全罗之败。《明史·杨镐传》载：“是役也，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委弃于一旦，举朝嗟恨。”

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种种致败的背景和成分存在了，那才是合理的解释。

《明史·杨镐传》上，谈及萨尔浒战前的辽东形势，有“辽三面受敌，无岁不用兵。自税使高淮腴削十馀年，军民益困。而先后抚臣皆庸才，玩愒苟岁月。天子又置万机不理，边臣呼吁，漠然不闻，致辽事大坏”的记载。然就这段记述，我们也须想到：

1. 其中有否可能，因史家思为杨镐略加洗脱，以求减轻他战败的责任？

2. 如果情况果真，那么税使高淮对辽东的“腴削十馀年，军民益困”，究竟“腴削”至何种程度？

3. 所谓“辽东大坏”，又“坏”到何种程度？

按其叙述，税使高淮应是残破辽东的主要角色之一，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明史》中虽没有他的专传，可是在《宦官陈增传》后，却附有《高淮传》，它的主要部分这样说：

高淮，尚膳监监丞也。神宗宠爱诸税监，自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而下，廷臣谏者不下百馀疏，悉寝不报。而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以故，诸税监益骄，而淮及梁永尤甚。

淮与陈奉，同时采矿征税辽东，委官廖国泰虐民激变，淮诬系诸生数十人，巡按杨宏科救之，不报。参随杨永恩婪贿事发，奉旨会勘，卒不问。淮又恶辽东总兵马林不为己下，劾罢之。给事中侯先春疏救，遂戍林，而谪先春杂职。

巡按何尔健与淮互讦奏，淮遣人邀于路，责其奏事人，锢之狱，匿疏不以闻。又请复辽东马市，巡抚赵楫力争，始得寝。

……御史袁九皋、刘四科、孔贞一，给事中梁有年等，各疏劾淮，不报。巡抚楫，劾淮罪恶万端，且无故打死指挥张汝立，亦不报。

淮因上疏，自称镇守协同关务，兵部奏其妄。帝心护淮，谬曰：“朕固命之矣。”

淮自是益募死士，时时出塞射猎，发黄票龙旗，走朝鲜索冠珠、貂马，数与边将争功。山海关内外，咸被其毒。又扣除军士月粮。

三十六年(1608)四月,前屯卫军甲而噪,誓食淮肉。六月,锦州、松山军复变,淮惧内奔。诬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逐杀钦使,劫夺御用钱粮。二人皆逮问,边民益哗。

薊辽总督蹇达再疏暴淮罪,乃召归。而以通湾税监张擘兼领其事。获阳竟死狱中;邦才至四十一年(1613)乃释。

自《明史·高淮传》所载,可知他是专替明神宗去聚敛金钱的税监之一。明代的皇帝,一个比一个昏庸糊涂,他们信任太监,胡作非为,常常对老百姓的死活与国家的安危全不置顾。这篇传记中,将高淮飞扬跋扈的情状虽略有所述,但他在辽东地区究竟如何的祸国殃民,由于篇幅和文字的简略,自然无法去清楚当时的详细情况。

今年初,笔者看到了《按辽御珰疏稿》一书^①,该书是曾任辽东巡按何尔健的疏奏,这些三百八十年前的文献,对于研究万历时期的辽东,确是很有价值的史料,它让我们从一位明朝封疆大吏的疏奏中,得以窥见到萨尔浒战前该地区各方面的情形。

何尔健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1554),死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依中国传统的年龄计算法,享年五十七岁。他在万历三十年到三十一年(1602—1603),也就是他四十九岁到五十岁时,受明神宗之命,出任辽东巡按。而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攻明,在万历四十六年(1619),萨尔浒之战,则爆发于第二年的早春时节。

所以,就时间上说,何尔健出任辽东巡按,适在明朝与后金之间萨尔浒大战的十馀年前,其时正是努尔哈赤从事统一女真内部,积极扩充并储备实力的时代。如果我们反观明朝的辽东巡按何尔健上呈神宗疏奏中所反映的当时辽东种种腐败不堪的情事,倘能了解了这一切,那么十馀年后,萨尔浒之战的“胜负之数,无待智者”已经足可判断了。

^① 是书为1982年8月中州书画社出版,由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二、何尔健及其“疏稿”

根据编校《按辽御档疏稿》一书的何兹全在“序言”里的说明，这本书实际上已经出版过三次了：第一次的刻本，大约在明万历三十六七年时，当时的书名大概是叫《按辽疏草》，也许是叫《御档疏草》；这从今日仍然保存着的原书“题辞”和“序”可以知道^①。惟是这部书在清初时，被列为违禁书籍，故早已毁板无存多年了。

不过，这本书在山东菏泽^②的何姓家族中，仍偶有保存的，所以民国初年，就有了第二次的刻本；据何兹全说：“大约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后期，族中管事的人把它石印出来，只印了一二百本或稍多。书名叫《何氏宗范》，‘疏稿’之外，还有何尔健手定的‘族约’和他以及他的子孙写的一些诗文。”这第二次的石印本，由于印数过少，何兹全以为“我们族中读书人不多，几十年来，几经沧桑变乱，除我这一本外，保存下来的恐怕不多了”。

这次——第三次的出版，是编校者何兹全把自己的家藏本贡献出来付印的。而且，他还在北京图书馆里找到一个明代万历时期刻本的缩微胶卷，在付印时，他说“我们把万历本和家本作了对校”，凡有异同处，均以符号注出以后才出版的，故这次付印应当比前出者较为完好。不过笔者以为，这次以“按辽御档疏稿”为书名，似乎不甚妥贴，如以“按辽劾档疏稿”、“按辽参档疏稿”为名，或者会更恰当一些。

为了要研究“疏稿”中叙事的是否真实可信，对于作者何尔健的生平与人格，我们也应做进一步的了解，较为遗憾的是，明史中竟没有何氏的传记，仅在宦官《高淮传》里提到了一次他的名字，说“巡按何尔健与淮互讦奏”，如此而已。不过，这至少使我们知道，当高淮征税辽东时，何尔健确曾做过辽东巡按。

^① 按今书前，仍有（明）若瀛撰《按辽疏草题辞》一篇；另有（明）吴楷撰《御档疏草序》一篇。

^② 菏泽亦称“济阴”，县名。属山东省济宁道，清时隶曹州府治。何尔健自明初以来，家族即世居曹州。